

1961年 赵朴初“舌战”印度反华派



1961年的赵朴初。

1961年3月16日，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印度召开，中国代表团以廖承志、刘宁一为正副团长，成员有周培源、赵朴初、金仲华、区棠亮（女）等。开幕前，印度“泰戈尔和平节”德里委员会打算召开一次会议，纪念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泰戈尔百岁诞辰。廖承志团长交给素享盛名的诗人赵朴初一个任务：代表中国代表团出席泰戈尔纪念会，并在会上发言。赵朴初精心准备了一个以颂扬中印友谊及文化交流为主旨的发言稿，并请廖承志、刘宁一审阅，他们看后很满意，批准了这个发言稿。

印度部长突然发难

纪念泰戈尔百岁诞辰的会议在一个宁静的晚上举行。不料纪念会进行中，作为会议主席的印度科学和文化部部长卡比尔突然发难，说：“泰戈尔生前很爱日本，但后来日本侵略中国，他就谴责日本。泰戈尔生前也很热爱中国，但要是他还活着，看到中国在西藏镇压个人自由，看到中

国侵略印度，他一定会谴责中国。”此话一出会场气氛霎时紧张起来。

赵朴初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严肃的会议上，一位印度官方人物竟搞突然袭击，明目张胆地攻击中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和主权，这也未免太嚣张了！这分明是利用泰戈尔的名义，进行反华宣传，破坏中印友谊！

赵朴初如果把事前精心准备的那一份讴歌中印友谊的发言稿简单地从头到尾地念一遍，显然已不适宜了。怎么办呢？作为抗

议，自己可以像一般外交官那样愤怒地离开，这样既省事，也不违背外事纪律；但主持人已经安排自己发言，突然离开，等于放弃了反击，放弃了阵地，似乎也不是最佳的选择。是退场还是照常发言？给赵朴初出了一个难题。

几位中国官员听到卡比尔的话，作为外交手段，立即退席以示抗议。先退席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二等秘书迅速赶到代表团住处，将这一突发事件向廖承志团长作了汇报，并说赵朴初还在场内。廖承志深感事态严重，急忙吩咐这位二等秘书：“快把赵会长叫出来。”

这位二等秘书返回会场时，万万想不到，赵朴初正在台上发言。他无法将廖承志团长的意见通知给赵朴初了，只好在一旁紧张地听赵朴初的发言。

赵朴初诗意地反击

当会议主席请中国代表发言时，赵朴初带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沉着地走上了讲台。会场

一片安静，大家屏住呼吸，等待着中国代表的反应。

赵朴初把讲话稿放在桌子一边，眼光巡视着整个会议大厅，脱稿发言了。他仪表端庄，态度从容，语气不慌不忙，平静而又义正词严地说：听了卡比尔先生的讲话，我感到震惊和遗憾。我们中国代表是抱着友好情意来纪念泰戈尔的，下面我的发言可以证实这一点……如果泰戈尔今天还在，看到有人利用他的名字来攻击中国，损害中印友谊，他一定认为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耻辱……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些少数叛乱分子作恶多端，背叛祖国。泰戈尔如果还在，应当受批评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想在中国内政上插手的人……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人民一直希望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用谈判的方式得到解决。泰戈尔如果还在，应该受批评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想把问题拖上十年二十年，企图继承英帝国主义不光荣遗产的人……

由于训练有素，赵朴初的语言组织得十分完整，又富有诗意，语言结构重复使用“泰戈尔如果还在……”的排比句，铿锵有力，加强了语言的震撼力，强化了反驳的语气。本来是印度极少数人准备看中国笑话的场面，一瞬间，完全成了诗人口若悬河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高级政治智慧的天才展示。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二等秘书发现，那位刚才还趾高气扬的印度部长，正悄悄地拿着手帕，揩去额上的汗水。静静的大厅里，诗人的声音一直在继续，在大殿屋宇间盘旋；中国人一向珍重同印度人民的友谊，但是友谊必须建筑在正义的基础上。歪曲正义地寻找友谊是寻求不到的。我相信绝大多数印度人民对我们是友好的，是主持正义的。我们中印人民应当共同警惕，不要让我们的友谊被人阻止与破坏……我想，如果泰戈尔还在，他一定会为今天的事

件感到耻辱和愤怒的，他绝不允许有人利用他的名义，来破坏中印友谊……

将发言内容写成长诗发表

即兴发言后，赵朴初该下台了。可是，逻辑思维训练有素的他，不紧不慢地拿起摆在桌子上原来准备好的讲稿，改变了义正词严的口气，用一种充满和平与友好的腔调向大家宣读。他这样做，是让全体与会代表们知道，中国是为寻求和平而来的，是为寻求友谊而来的，这篇发言稿，才是自己、中国代表团的本意和初衷，才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本意和初衷。此外，从政治纪律来说，这个讲稿是中国代表团审核过的文件，按程序宣读它，也是组织纪律的需要。

听完了赵朴初针对卡比尔发难的即兴的高水平的演讲，又听了赵朴初代表中国代表团宣读的事先准备的充满友好的文件，会场响起了潮水般的掌声。这鼓掌的，不仅有五洲四洋的代表，还有印度本国的代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二等秘书使劲地鼓掌，兴奋得热泪盈眶。赵朴初的发言，不仅需要高超的智慧，更需要过人的胆识。他若一语不慎，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公布于世，不仅违反了外事纪律，更重要的是有损于国家的利益和形象，其结果将不堪设想。

廖承志正在焦虑地等待会场上的消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不清楚会场发生了什么。一见赵朴初回到大使馆，他就急忙问：“怎么样？”

赵朴初把自己的讲话和会场上的反应向廖承志等代表团的同志作了汇报，廖承志听后，兴奋地拍了一下赵朴初的肩膀说：“好！讲得好！有理有利有节。”

听到廖承志的夸奖，赵朴初高兴地笑了。

会后，赵朴初将其发言内容写成《如果泰戈尔还在》的长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人协）

得名于建筑材料“八宝”

八宝山，位于石景山区东部，为西山山脉前平原上的孤立残丘，得名于建筑材料“八宝”。

所谓“八宝”，指的是马牙石、白垩、青灰、红土、坩土、黄浆、板岩、砂岩八种黏土矿物。马牙石，又称方解石，主要成分为石英，也是人类最早认识和利用的矿物；白垩，俗称白土子或大白，白色，质软，是石灰岩的一种，分布很广；青灰，是一种含有杂质的石墨，青黑色，常用来粉刷外墙面或糖炉子，也可用作颜料；红土，是较好的天然地基和筑坝材料；坩土，也称耐火土，是火炉内膛的主要原材料，还可以制成耐火砖；黄浆是木器的涂料；板岩常用作制造房瓦及石砚的原料；砂岩是研磨、玻璃、建筑等工业的原材料。

八宝山的由来传说

八宝山的由来在当地有一段有趣的传说：相传八宝山脚下的山洞里藏着八件宝贝：金牛、金马、金鸡、金碾子、金磨、金豆子、金簸箕和金筐箩。很早以前，这里住着一对姓李的老头和老太婆，他们没儿没女，只能靠种丝瓜过日子。一年，他们在院

八宝山里有哪八件宝

子里种了一架丝瓜，奇怪的是就是结不出瓜来，只有瓜秧越长越长，好不容易开了一朵花，结出的丝瓜却长得上粗下细，像一个倒挂的葫芦。一天老两口正在门口乘凉，看见从南边来了一位先生，到了他们家门前看见这个丝瓜忽然站住了。只见他一会儿朝山看看，一会儿又朝瓜架上的丝瓜看看，用手指掐算了半天，就冲老两口走了过来。

这位先生走近了，提出要买架上这个唯一的丝瓜。他告诉老两口自己买瓜是要配药给病人治病。老两口一听答应了，只是坚决不收钱。先生临走的时候告诉他们：“这瓜不熟的时候不能摘，等到熟了我自然会来的。”其实这位先生不是用瓜来配药治病，而是来寻宝的。他掐算到山下埋藏着宝贝，但取宝需要开山的钥匙，当他看到这个丝瓜时，明白了它正是开山的钥匙。

先生走后，老两口对丝瓜照看得格外用心，可是这一年秋天的时候天气反常，刚过了立秋就开始下霜，他们怕把丝瓜冻坏了，于是就提

前摘了下来，放在一个木匣子里面，等待先生来了以后交给他。

九月初八这一天傍晚，先生果然来了，当他看到老两口提前摘了的丝瓜时，跺着脚说：“坏了，摘早了，这下不管用了。”只好叹着气把丝瓜拿走了，老两口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跟着他来到山下，想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只见风水先生来到这山坡前，用瓜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山坡上立即出现了一扇门，但只开了一道小小的缝隙。老两口一看，里面都是宝贝，有金牛、金马、金鸡，还有金筐箩、金簸箕，靠门还有一个金碾子在转，从碾子上掉下来的全是金豆子。只听风水先生自言自语道：“要不是摘早了，我就可以进去了！”他将手伸了进去，先拿了金簸箕，可是门缝儿太小，怎么也拿不出来，就在这时，金鸡叫了起来，风水先生说声：“不好！”连忙扔了金簸箕，抓了一把金豆子。正要往外拿，老头儿过去打了他胳膊一下，手一缩，金豆子全掉在洞里了，门也关上了。风水先生知道自己理

亏，不声不响地走了。从此，人们都知道这座山下埋着八件宝贝，就把它叫做八宝山了。

1970年改称八宝山革命公墓

其实，八宝山原名黑山，主要是由东西两座山峰构成的，最高处海拔103米，是西山前山岗阜。全山东西长约1.2公里，南北宽约0.6公里。八宝山历史名胜颇多，明代时有延寿寺、灵福寺、朝阳庵，西峰上建有娘娘庙，其中最著名的还是褒忠护国寺。褒忠护国寺又名黑山护国寺，是明代永乐年间为纪念名将刚炳所建，寺内有刚炳墓，现仅存墓碑和墓前石龟。日



北京八宝山外景

鲁迅为何没有写成长篇小说

鲁迅生前有“中国的高尔基”之称，但他一生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更令人遗憾的是，鲁迅曾有过3次写长篇小说的打算，并且均已构思成熟，有的甚至动了笔。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没能写出来。

1921年春，鲁迅计划写长篇小说《唐玄宗与杨贵妃》，已将草稿拟订，内容也构思好了。可是，当时鲁迅应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其小说《阿Q正传》又在《晨报·副刊》连载，必须逐段加工、修改，再加之《呐喊》一书亟待付印，“诸多事宜缠身”，便只好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搁置一旁了。

1932年5月，鲁迅在上海结识了因腿部受伤而住院治疗的陈赓将军。其间，他听陈赓将军讲述了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边区反“围剿”的许多故事，激动不已，马上向陈赓索取了相关的油印材料，决定写一部《飘落的红云》，其篇幅估计15万字。但是，鲁迅此时忽然接到母亲生病的电报，返回北京探望后，他又应几所高校邀请讲学，年底到了上海，适逢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除参加策划外，还当选为执行委员，杂事缠身，忙得不亦乐乎。这部关于红军的小说也终于未能写成。

1935年6月，鲁迅又萌生了写一部反映我国4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的念头。但是，不久即惊闻挚友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的噩耗，鲁迅痛不欲生。接着他又为另一位志同道合的亡友方志敏烈士整理遗稿。这些工作耗费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

鲁迅拟写的长篇除了以上的3部小说外，还有另外的3部大作。他曾对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巨著《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推崇备至，他也想写这样的长篇，他计算着：“这个倒可以慢慢想想看，如果能够再活10年，慢慢写，一年写一本也可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没有写成。

由于长年累月伏案劳作，鲁迅先生终于积劳成疾，不幸于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他那未来得及写就的6部长篇成了永远的遗憾。诚如巴金所说：“鲁迅处于那种特定年代的特定环境，终因精力和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实现自己的夙愿，成为我国文坛的一大憾事。”

（法明）